

北京大學傳奇 (上)

(本文插圖刊第5、6、43至46頁)

● 王 成 聖

京師大學堂的誕生

北京大學的前身是京師大學堂，這是中國最早的國立大學。在這以前，可以上溯到中國古代的太學和國子監，這些也可以說是國立的大學。入學的人都以舉、貢、生、監等為主要分子。但具有現代化規模的大學，應從北京大學算起。

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戰爭後，由於列強對華的加緊侵略，中國面臨有被瓜分的危險。於是清朝統治階級中一些開明人物鼓吹維新，學習西方，興辦學堂，培育人才，以圖自強。一八九六年六月，刑部左侍郎李端棻在給清廷的「推廣學校折」中，第一次正式提議設立「京師大學」。他建議「自京師以及各省府州縣皆設學堂」，「京師大學，選舉貢、監年三十以下者入學，其京官願學者聽之。……以三年為期。」一八九八年初，由康有為、梁啟超等人發起的變法維新運動日益發展，康有為幾次上書光緒，建議加速籌辦京師大學堂。他說：「京師設立大學數年矣，宜督促早成之，以建首善而觀萬國。夫養人才猶種樹也，築室可不月而就，種樹非數年不蔭。今變

法百事可急就，而興學養才，不可以一日致也。故臣請立學亟亟也。」他講這些話，極其深刻，並有遠見性，同年六月，光緒下「明定國是詔」，正式宣布變法。

在詔書中，康有為強調：「京師大學堂為各行省之倡，尤應首先舉辦，着軍機大臣、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會同妥辦議奏。所有翰林編檢、各部院司員、大門侍衛、候補候選道、府州縣以下官、大員子弟、八旗世職、各省武職後裔，其願入學堂者，均准入學肄習，以期人才輩出共濟時艱。」七月四日，光緒正式下令，批准設立京師大學堂。命令中說：「京師大學堂為各行省之倡，必須規模宏遠，始足以隆觀聽而育人材」。就這樣，京師大學就創辦起來了。於是，由梁啟超代軍機處和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草擬了京師大學堂第一個辦學章程。章程規定辦學方針有兩條：「一曰中西併用，觀其會通，無得偏廢；二曰以西文為學堂之一門，不以西文為學堂之全體。以西文為西學發凡，不以西文為西學究竟。」從這裏可以看出，中國當時辦學方針，不像日本明治維新那樣徹底學習西洋，在力求保持中國所固

有的文化。

大學堂校址設在地安門內馬神廟和嘉公主舊第。計原有房屋三百四十多間，並新建房屋有一百三十多間。這就是以後的北大二院。同時在北海沿購置房產，開辦譯學館，即後來的北大三院。一九〇三年，京師大學堂還建立了醫學館。大學堂辦學的經費當時規定為白銀三十萬兩，常年用款為二十萬零六百三十兩。戶部指定以華俄道勝銀行的中國政府存款的利息支付，不敷之數由戶部補足。

首任管學大臣計劃

京師大學堂的第一任管學大臣是孫家鼐，安徽壽縣人，生於一八二七年，歿於一九〇九年，咸豐狀元，曾任工部、禮部、吏部尚書，與翁同龢同是光緒的老師，在政治上靠近光緒。孫家鼐受命為管學大臣後不久，即向光緒提出了籌辦大學堂的具體計劃，對京師大學堂的第一個辦學章程作了某些修改和增補。其主要內容為：一為舉人，進士出身的京官設立仕學院；二、大學堂畢業生，由管學大臣出具考語，各就所長錄用。

「學政治者歸吏部，學商務礦務者歸戶部，學法律者歸刑部，學兵制者歸兵部及水陸軍營，學製造者歸工部及各製局，學語言文字公法者歸總理衙門及使館參隨，終身選轉，不出本衙門，俾所學與所用相符，冀收實效；三、精簡學科門類，取消兵學；四、編譯局主要編譯西學各書，舊有經書不得隨意刪節，譯書局編纂各書，由管學大臣送光緒欽定，再行頒發，對「悖謬之書，嚴行禁止」；五、總教習可設二人，分管中學和西學。他還建議：「大學堂事當創始，擬派員赴日本遊歷，考察學務。」經孫家鼎推荐，清廷任命許景澄和丁韪良為大學堂總教習。許景澄浙江嘉興人，同治進士，曾任出使法、德、意、荷、奧等國大臣，他工駢文，對經世之學頗有研究。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是美國基督教傳教士，一八五〇年來中國，在寧波傳教，後任美國駐華公使的翻譯，一八六九年——一八九四年，任北京同文館總教習，許、丁二人担任京師大學堂總教習，分管中學與西學。

慈禧一怒竟然停辦

戊戌百日維新被鎮壓後，京師大學堂雖然繼續照辦，但實際上一度陷於停滯。到一八九八年十一月開學時，學生不到一百人。一八九九年，學生雖有增加，但也不到二百人。當時西太后又下令恢復八股取士的科舉制度，大學堂學生也只有參加科舉考試得中後，才能取得舉人、進士等頭銜，獲得做官的資格。因此，每到考期，大學堂學生便紛紛請假奔赴考場。

一九〇〇年，孫家鼐為反對西太后慈禧陰謀廢黜光緒帝位，憤而辭職。許景澄以總教習身份暫行管理大學堂事務。同年夏天，義和團進入北京，隨即八國聯軍也佔了北京，大學堂學生四處逃散，八月三日，慈禧下令停辦大學堂。不久，許景澄因反對利用義和團攻打洋人的政策，而被慈禧處死。

八國聯軍攻入北京後，迫使清朝政府簽訂了喪權辱國的「辛丑條約」，國人憤慨至極，因而在「一九〇一年多，清政府「迫於時變，維新之論復起」。清廷感到需要有一批既有文化科學知識，又能忠於王朝的知識份子為其服務，於是又宣布逐步廢除八股取士的科舉制度，下令各省舉辦學堂。一九〇二年一月十日，清政府正式下令恢復京師大學堂，並任命張百熙為管學大臣。

張百熙，生於一八四七年，歿於一九〇七年，湖南長沙人，同治進士，早年担任過光緒的侍讀。甲午戰爭時，曾上疏彈劾李鴻章主和投降。戊戌政變時，因荐舉康有為獲罪，受革職留任處分。義和團運動後，他受到清朝重用，他既是欽命管理大學堂事務大臣，又是吏部尚書，他掌握教育和人事大權，這反映出當時清政府對張百熙的信任和對京師大學堂的重視。

大學分科培養人才

張百熙到任後，很想將京師大學堂辦好，在他主持下制定了「欽定京師大學堂章程」。大學堂分大學預備科、大學專門分科和大學院三級。預備科又分政、藝兩科，以經史、政治、法律、

通商、理財等事隸政科，以聲、光、化、農、工、醫、算等事隸藝科。預科學制三年，畢業後可入大學專門分科，並給予舉人出身。大學專門分科即本科，分科相當於後來的學院，科下又分門目，相當於後來的系。當時規定分科大學共設七科三十五門。

(一) 政治科，下分政治學、法律學二門。

(二) 文學科，下分經學、史學、理學、諸子學、掌故學、詞章學、外國語言文字學七門。

(三) 格致科，下分天文學、地質學、高等算學、化學、物理學、動植物學六門。

(四) 農業科，下分農學、農業化學、林學、獸醫學四門。

(五) 工藝科，下分土木工程、造船學、造工學、電氣工程、建築學、應用化學、採礦冶金學等八門。

(六) 商務科，下分簿記學、產業製造學、商業語言學、商法學、商業史學、商業地理學等六門。

(七) 醫術科，下分醫學、藥學二門。

大學專門分科學制三至四年，畢業後可升入大學院深造，並給予進士出身。大學院相當於後來的研究所。

此外，大學堂另設速成科，以期在培養人才方面，收得急効。速成科分為二館：「一曰仕學館，二曰師範館。凡京官五品以下，八品以上，以及外官候選，暨因事留京者，道員以下，教職以上，皆准應考入仕學館。舉、貢、生、監等，皆准應考入師範館。速成科學制三至四年。畢業

後可担任初級官吏或學堂教習。

經過一段時期的籌備，京師大學堂於一九〇二年十月十四日正式舉行招生考試，首先招考速成科學生。考試科目有史論、輿地策、政治策、交涉策、算學策、物理策以及外國文論等七門（現在北京大學檔案室還存有京師大學堂各科考試題目）。

這是京師大學堂第一次舉行比較正規的招生考試。考試結果，仕學館錄取新生三十六名，師範館錄取五十六名。十一月二十五日，大學堂再次招生，仕學館、師範館又錄取新生九十名。十二月十七日，大學堂舉行開學典禮，正式開學。後來北京大學就以十二月十七日這一天為校慶日。

延聘名師購置圖書

爲了辦好京師大學堂，張百熙十分注意選用教職員。他認爲「大學堂開辦在即，經理一切需員」，「此次奉旨切實舉辦，自應破除積習，不拘成例用人」。要把那些「才具優良，通達時務」、「明練安詳，學有根底」的人員留在大學堂差委。張百熙尤爲注意物色總教習的人選。他認爲「大學堂之設，所以造就人才，而人才之出，尤以總教習得人爲第一要義，必得德望具備，品學兼優之人，方足以膺此選。」經多方瞭解和研究，他決定聘請當時任冀州知州的吳汝綸爲大學堂總教習，吳汝綸安徽桐城人，同治進士，是清末散文學家，桐城派的一名著名領袖。他在舊學方面很有根基，對新學和洋務也頗注意。張百熙

稱譽他說：「學問純粹，時事洞明，淹貫古今，詳悉中外，足當大學堂總教習之任。」但是「汝綸力辭，百熙匍匐跪請。」吳汝綸不得已答應先「往日本訪詢學制，歸以報命」。他遂即去日本考察教育制度三個月。但不幸的是吳汝綸因病於一九〇三年去世。

張百熙還聘請當時著名的翻譯家嚴復爲京師大學堂譯書局總辦，林紘（琴南）爲副總辦；聘請辜鴻銘（鴻銘）爲副總教習，孫詒讓、蔡元培等人爲經史教習。還聘請剛從日本留學歸來的范源濂和剛從英國留學歸來的柏銳分別爲日語、英語助教。此外，繼續讓丁韞良爲西學總教習。當時在大學堂的外籍教習有很多人，英語教習秀羅春於一九〇〇年八國聯軍侵佔北京的動亂中被殺害了，張百熙發給白銀三千兩，以示撫卹，這對外籍教師起了好的影響。

不久另聘日本學者服部卯之吉、岩谷孫藏、高橋作衛爲教習。爲了引進西學，張百熙還通過出使美國的欽差大臣取得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耶魯大學、賓夕法尼亞大學等十三所大學的課程書目以作爲編訂大學堂課程和教材的參考。一九〇二年，大學堂設立藏書樓，除從國子監調撥各類書籍外，並由管學大臣咨文各省官書局，將已刻經史子集及時務書，每種提取十部或數部送京師大學堂，以充實藏書樓。得到各省官書局積極支持。此外，大學堂還通過洋教習從歐美日購置各類科技圖書，例如一九〇五年日文教習服部卯之吉從日本一次採購數學、物理、動物各類圖書一百八十五部。在大學堂的藏書中有不少是宋、明

刻本和明、清的手抄本，十分罕見。今日北京大學圖書館的藏書在中國大陸除北京圖書館外，居第二位。而稀有的善本書更可獨占鰲頭，這不能歸功於張百熙對北大的悉心規劃。

一九〇三年，洋務派首領張之洞會同張百熙又把京師大學堂的章程作了修改。修改後的章程稱爲「奏定大學堂章程」。這個章程和「欽定京師大學堂章程」的不同點主要有：（一）大學分科除原有七科外，增設經學科，下分周易、尚書、毛詩、春秋左傳、春秋三傳、周禮、儀禮、禮記、論語、孟子、理學等十一門，突出了經學的地位。其他各分門也略有變動，共計八科四十六門。（二）大學院改名爲通儒院，大學堂分科畢業生才可入通儒院，研究年限規定爲五年，以能發明新理、著有成書、能製造新器，足資利用爲畢業。（三）大學堂設總監督、總監督受總理學務大臣的節制，總管全學堂各分科大學事務，統率全學堂人員。「奏定大學章程」共分七章，對辦學宗旨、招生辦法、學制年限、各級人員管理等都有較明確的規定，對各科各門要學的課程，編列也比較詳備。這個章程當時會刊印出版，作爲與國外大學交流的一個主要材料。一九〇四年，清政府又以總理學務大臣專管全國學務，而另設京師大學堂總監督，專管大學堂事務。總監督相當於後來大學校的校長職位。

第一批留學生出國

一九〇四年，京師大學堂從速成科學生中選出四十七人派往外國留學。其中張耀曾等三十一

人派赴日本，俞同奎等十六人派赴西洋各國。這是京師大學堂派出第一批留學生。同年，大學堂預科正式招生，各省分給的名額為：江蘇、浙江、湖南各二十四名，四川、福建、廣東各二十名，湖北、安徽、江西各十五名，直隸十二名，河南八名，奉天、山東、山西、陝西、雲南各六名，甘肅、貴州各四名。

向萬歲牌三拜九叩

一九〇七年，京師大學堂仕學館和師範館招收的第一批速成科學生相繼畢業。三月十三日，師範館舉行了隆重的畢業典禮。學部大臣、總監督、全體教習、學生都參加。畢業儀式開始後，先由總監督率領全體學生向「萬歲牌位」行三拜九叩禮，然後再向「聖人位」行三拜九叩禮，隨後學生代表講話，最後由總監督發給學生畢業證書。畢業證書用厚宣紙制成，長七十公分，寬六十公分，每邊印有象徵祥瑞之意的飛龍二條，在四角上分別印有「畢、業、文、憑」四個大字，十分工整。證書上印有西太后慈禧的一道「懿旨」，載明了畢業生的考試成績，並蓋有「京師大學堂關防」和總監督的印章。整個說來，式樣莊重，樸素大方。發完證書儀式就結束了。這是京師大學堂第一次舉行畢業典禮，也是大學堂的第一批畢業生。

首次舉辦運動大會

一九〇五年四月二十四日，京師大學堂舉行第一屆運動會，這是中國近代最高學府舉行的第

一次運動會。運動會的比賽項目有一百米至八百米的競走，有跳遠、跳高、撐竿跳高、擲槌、擲球、越欄競走、犬牙形競爭、拉繩等。這次運動會的召開，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京師大學堂的教學生活，也為研究中國近代的體育史，提供了珍貴的資料。

在京師大學堂創辦時期，正是中國處於內憂外患之時，民族生存危機日益深重，許多學生都不能安心於求學，他們把自己的命運和國家民族的命運很自然地聯繫在一起，表現了高度的民族責任感和強烈的愛國精神。例如在一九〇三年，為反對沙皇俄國侵占中國東北地區，京師大學堂學生積極參加了各界的抗俄運動。一九〇三年的四月三日，大學堂仕學館、師範館的師生二百多人發起舉行全校大會，聲討沙俄侵略。在會中有幾十個師生講演，要求滿清政府拒絕接受沙俄的無理要求。發言者義憤填膺，「言者痛哭流涕，同學齊聲應許，震撼天地。」會後由七十三人署名草擬了「京師大學堂師範、仕學兩館學生上管學大臣請代奏拒俄書」。書中指出沙俄是玩弄「以甘言重幣餌於先，恫嚇虛聲繼於後」的目的。書中要求滿清政府堅決拒約抗俄，嚴正表示我們學生絕不能袖手旁觀，坐視祖國瓜分之慘禍。

這次京師大學堂學生的愛國運動，發生了很大影響，同時獲得了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派的讚賞，與此同時也受到清政府的壓制。這次運動是北京大學歷史上發生的第一次政治性羣衆運動，也是北大師生共同譜出的愛國主義樂章，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

北京大學正名開始

一九一一年爆發了辛亥革命，結束了延續兩千多年的中國君主專制政體，建立中華民國。中國政局發生了重大變化。

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孫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成立臨時政府，蔡元培被任命為臨時政府教育總長，一九一二年四月，蔡元培遂北上到教育部視事，並派員接收了前清政府的學部。

一九一二年二月，宣統遜位。這時袁世凱已竊取了大總統的職位，他任命嚴復為京師大學堂監督。三月八日，嚴復到校視事。四月二十四日，蔡元培在北京正式就任教育總長職務。五月一日，教育部下令將京師大學堂名稱改為北京大學，廢除總監督，設校長，各科設學長。五月三日，嚴復被任命為北京大學第一任校長兼文科學長。五月十五日，北大正式開學，這樣，由於清王朝

的覆滅而陷於停辦的京師大學堂，在嚴復的主持和推動下，以北京大學的校名，又得到復甦。

嚴復生於一八五三年，歿於一九二一年，字又陵，又名畿道，是近代啟蒙思想家、翻譯家。福建侯官人。他早年畢業於福州船政學堂，後被派往英國海軍學校留學，回國後任北洋水師學堂總教習。甲午戰爭後，他發表很多主張變法的論文，並大聲疾呼：「今日中國不變法，則必亡是矣」。他最早翻譯出版了赫胥黎的「天演論」，以「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進化學說提醒國人，號召人們救亡圖存，「與天爭勝」，對當時思想界有很大影響。

嚴復校長進行革新

嚴復接辦北京大學後，時間並不長，總共只有九個月時間，但在這不長的時間裏，他還是對北大作了不少改革。如把經科合併到文科，把格致改為理科。同時積極開始介紹西方文化思想的課程，大力主張學習西方的新學；還提倡學習外語，所有課程除國學外，都用外語講授。一時「校中盛倡西語之風，教員室中，華語幾絕。開會計事，亦用西語。所用以英語為多，有能作德語者尤名貴，為眾所稱羨」。這種狀況對促進外語學習收到了較好的效果。

嚴復雖然對北大貢獻很多，但由於他和教育部之間的矛盾加深，於一九一二年十月十七日辭去北大校長職務，離京赴津。「學生意欲挽留，而教部不允所請」。十月七日，北京政府任命章士釗為北大校長，但章士釗因公在滬，從未到校

就職，十一月二十九日，章士釗不得不辭去校長職務。十二月二十七日，何燭時被任命為北大校長。何於一九一三年一月四日到校視事。

何燭時生於一八七八年，歿於一九六一年。字燮侯，浙江諸暨人，早年求學於浙江大學的前身求是書院，一八九六年留學日本。一九〇五年七月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探礦冶金系，獲工學士學位。

何燭時在日十年，一九〇六年春回國後在教育部任主事兼京師大學堂教習，旋任大學堂工程監督（相當於後來的學院院長）一九〇三年一月任北大校長後，刻意整頓，使北大又有發展，學生也有增加。

由於何校長與當時北京政府教育總長汪大燮因北大費用問題有矛盾，加以辦學諸事並不順利，一九一三年十一月五日，何燭時辭去北京大學校長職務。同月十三日，教育部委任北大工科學長胡仁源暫行代管校務，一九一四年一月八日，胡仁源被正式任命為北大校長。

在胡仁源任校長（一九一四年一月——一九一六年十二月）期間，北大的規模又有擴大，各學科又得到充實和調整。一九一三年春起，北大先後多次招收新生入學，當時全校學生為七百八十一人，到了一九一六年秋季開學時全校學生已達一千五百零三人，增長了一倍多。

由於學生人數日增，校址愈形狹小，教學用房和生活用房都發生了很大的困難。經胡仁源與比利時儀器公司商洽，借款二十萬元，建造大樓，所借之款在二十年後還清，本利約四十四萬元

，由歷年所收學生宿費內償還。

這幢新建樓房於一九一六年十月破土動工，一九一八年八月建成，共有三百多間居室，這就是後來的北大第一院，座落在漢花園（今沙灘），也就是在中國近代歷史上具有重要歷史地位的著名紅樓。

軍閥勢力侵入校園

在胡仁源任校長期間，北大固然有較大發展，但同時由於袁世凱陰謀復辟帝制，其種種倒行逆施，不能不給北大帶來許多消極影響。袁世凱策動軍閥官僚和御用文人們拼湊各種各樣的請願團體，上書國會要求改變國體，擁戴他當皇帝。袁世凱先封北大校長胡仁源為中大夫，又授給北大一些教授四等和五等「嘉禾勳章」。接着袁世凱的兒子袁克定就「使人說胡仁源率大學諸教授勸進」，但遭到北大教授們的拒絕。

「胡仁源本諸教授之意持不可，謝使者。大學遂獨未從賊。」但是這個權迷心竅的獨裁者袁世凱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居然宣布自一九一六年起，改元「洪憲」，準備舉行「登基」大典。北大的衆多師生堅決反對袁世凱的復辟醜劇。當時文科教授馬敘倫為了表示抗議，憤然離職出走，一時有「掛冠教授」之稱。一九一六年六月，竊國大盜袁世凱終於在舉國反對和眾叛親離的窘境中死去。這年十二月六日，胡仁源辭去了北大校長職務。十二月二十六日，在馬敘倫等人的推荐下，蔡元培被任命為北京大學校長，此後北大的歷史就進入了一個新階段。（下期續完）